

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五十六期
2002年5月 頁 29~68
臺灣大學文學院

嚴復與梁啟超

黃克武 *

摘要

嚴復與梁啟超相差近 20 歲，在清末民初思想界均曾發揮關鍵性的影響。本文主要依賴嚴梁之著作、書札中提及對方的史料與相關文獻，來釐清雙方之友誼，並以此反省近代中國知識份子間的互動。簡言之，嚴梁在思想上親和，在私交上卻頗為疏離。在思想路向上，光緒 29 年（1903）之後，嚴梁都採取溫和漸進的「調適模式」，反對激烈的「轉化」主張。但奇特的是兩人之間的交往主要不在學術討論，而在詩文酬和，以及嚴復單方面對梁政治立場的抨擊。嚴復從戊戌前夕到過世之前，一貫地在公私場合批評任公在言行上的激烈、躁進，造成中國的亂象。他完全抹煞任公在光緒 29 年訪美歸來之後從激進到保守的重大轉變。作為後輩的任公則默默地接受嚴復的批評，除了光緒 23 年（1897）所寫的〈與嚴又陵先生書〉之外，我們看不到任何的反駁。嚴梁之間的關係，和梁啟超、胡適之間的關係有明顯的不同。梁胡之間有更多學術上的討論，少有政治辯論，而沒有詩文酬和。相對於嚴復對任公激進、革命傾向的批評，胡適以為任公最大的貢獻在「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最大的缺點是「衛道」。嚴復與胡適對任公評價的差異，顯示中國激烈化的走向日盛一日。嚴梁之交往亦顯示雙方缺乏合理的對話，無法以容忍精神來尋求團結與合作，這是近代中國許多知識份子所面臨的一個難題，也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發展的一

本文 91.3.28 收稿；91.4.17 通過刊登。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個嚴重障礙。

關鍵詞：嚴復、梁啟超、時務報、國聞報、胡適

Yan Fu and Liang Qichao

Huang Ko-wu *

Abstract

Yan Fu (1854-1921) was twenty years older than Liang Qichao (1873-1929). Both men exerted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the intellectual world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ased on the works by Yan and Lia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m, and other materials, this paper studies their friendship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s among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To put it briefly, Yan and Liang were intellectually intimate but socially alienated. In terms of their intellectual approaches, especially after 1903, Yan and Liang both adopted a mild, gradualist, accommodative mode of thinking, and rejected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ve alternative. Yet the major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were not intellectual discussions, but poems written to each other on special occasions and Yan's unilateral criticism on Liang's political stance. From the eve of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to his death, Yan consistently criticized Liang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for radical, "irresponsible,"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 and action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radicalization" of chaotic China. Yan completely ignored Liang's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that took place after his trip to America in 1903. After this transformation Yan and Liang in fact shared a very similar intellectual outlook. Being a member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Liang just accepted Yan's criticism without arguing with Yan directly (his letter to Yan written in 1897 was an excep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 and Liang was very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different from that between Liang and Hu Shi (1891-1962). Liang and Hu had more intellectual discussions, less political debates, and did not write poems to each other. In contrast to Yan's criticism of Liang's radical thought, Hu said that Liang'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was "pointing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glorifying Western virtues." And Liang's biggest mistake was to "protecting Chinese culture." The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Liang by Yan and Hu indicate the growing radicaliz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an and Liang also reveals their lack of reasonable dialogue and their failure to cooperate on the basis of the idea of tolerance. This failure has been a serious problem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times and an obstac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China.

Keywords: Yan Fu, Liang Qichao, Shiwu bao, Guowen bao, Hu Shi

嚴復與梁啟超

黃克武

一、前言

二、嚴梁之初識：戊戌變法前夕

三、嚴梁「交鋒」：戊戌之後

(一)、《清議報》階段

(二)、《新民叢報》時期

1.《新民叢報》中對《原富》與《群學肄言》的評介

2.嚴復批判東學

3.嚴復評點《老子》以暗諷任公

(三)、辛亥革命之後嚴梁的交往

四、結論

一、前言

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之間的交誼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在這方面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以嚴復（1854-1921）研究來說，嚴復與郭嵩燾、吳汝綸、陳寶琛、熊育錫（純如）、呂碧城等，都有學者做過專題研究；¹在梁啟超

1 梁義群，〈嚴復與吳汝綸〉，《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8），頁 567-577。林偉功，〈嚴復與陳寶琛的交誼初探〉，《93 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頁 509-516。汪榮祖，

(1873-1929) 研究方面，梁啟超與康有為、黃遵憲、汪康年、蔣方震、張君勵、張東蓀、胡適、徐志摩等的師友關係，也深受學者關注。²

嚴、梁相差近 20 歲，兩人在中國近代思想界均為引領風騷的英雄人物，他們之間的交往情況究竟如何？嚴復在光緒 5 年（1879）自英返國之後沈寂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甲午戰後才以數篇警世文章引起人們的注意。受到戰敗的刺激，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等文，鼓勵變法維新，倡導提升民德、民智、民力，以追求富強。³接著他又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己權界論》、《穆勒名學》等，成為引介西學的先驅。梁啟超也大約在同時崛起，他不但積極參與其師康有為所號召的維新變法，而且在思想言論方面，以感人的筆調、豐富的內容，和大量的作品，討論中西學術、品評時事，因而感動了無數的讀者。尤其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任公流亡日本，這時他所主持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成為許多年輕朋友最喜愛的讀物。嚴復與梁啟超都是一方面沈浸於傳統學術，另一方面對西學有深入的認識，成為近代中國致力於會通中西文化的代表人物。然而嚴復傳統學術的根基是師承吳汝綸的桐城派；任公則是源於康有為的今文經學與陸王心學。再者，嚴復留學英國，能透過英文直接引介西學；任公則無法閱讀西文，他主要依賴日本學術界（即「東學」）來認識西方文明，因此在西方知識來源上，嚴梁亦分屬不同的知識傳統。

有關嚴復與梁啟超的研究非常豐富，然而有趣的是還沒有學者對兩人的交往過程做過較為細緻的分疏。這或許是因為兩人思想上相關，私交卻不親

¹ 〈激賞嚴又陵〉，《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與道咸同光時代》（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 269-281。薛隆基，〈熊育錫與嚴復〉，《江西方志》，1991：1。黃克武，〈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出版中）。

² 例如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出版社，1978），頁 254-276；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份子的親和與排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5 下（1986），頁 81-108。

³ 《直報》是嚴復等人創辦《國聞報》之前，天津唯一的報紙，光緒 21 年（1895）1 月由德國人漢納根創辦，楊蔭庭任編輯。見史和、姚福申、葉翠娣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頁 208-209；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1350。

密所致。誠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說：

嚴復對於梁啟超後來發展的影響遠比其師康有為對他[梁啟超]的影響來得深刻。但是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畢竟是通過科舉考試而晉升仕途，而且這一群人十分注意將他們的思想放在傳統的脈絡之中。他們形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儒家士大夫派系，而嚴復不屬於這個圈子。⁴

張灝也說，「嚴復不是梁的密友，他們之間的交誼主要是在思想方面」。⁵兩人在思想上的交會，最早是任公接受了嚴復所宣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張灝說「早在 1896 年，梁便已接觸了後來在他個人思想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⁶張朋園也指出，「嚴譯《天演論》及所撰四篇傳誦一時的文章，對『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有所影響，後來梁氏在日本廣泛接觸此一學說，其個人所撰文字，多以進化論為理論架構，社會達爾文主義才在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的影響」。⁷

此外，嚴復將社會達爾文主義、英國自由主義與對傳統的尊重結合起來的調適性的思想架構，強調群己權界、己群並重，反駁個人主義，以及肯定傳統、會通中西的精神，也對任公有所影響。⁸就思想發展的軌跡來說，嚴復、梁啟超都經歷了從激進到穩健、保守的過程。嚴復的轉向較早，甲午戰後他的思想最為激烈，至光緒 28-9 年（1902-3），他陸續發表〈主客平議〉、〈與《外交報》主人書〉等文，出版《群己權界論》與《群學肄言》等譯作時，調適性思想模式已經形成。任公則是在光緒 29 年（1903）訪美之後，思

4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64]), p. 83.

5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64.

6 同上。

7 張朋園，〈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現代化：嚴復、梁啟超的進化觀〉，食貨月刊社編輯委員會編，《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79），頁 193-194。

8 例如梁受到嚴的影響，傾向於從群己權「界」的概念來思索個人自由的意義，見黃克武，〈梁啟超與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0（1998），頁 129-131。

想發生重大變化，其變遷的主要方向其實就是向調適型的「嚴復模式」靠攏，企圖建立一種「非彌爾式」、具有中國特色之自由主義的現代國家。總之，嚴、梁代表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調適傳統」(accommodative tradition)，他們與當時社會主流主張激烈變革、暴力革命的「轉化傳統」(transformative tradition)相抗衡，卻不幸地在近代史上成爲「一個被放棄的選擇」，至 1980 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才逐漸受到新的肯定。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誠如前述，嚴復與梁啟超在思想上雖契合，在現實生活中卻有些疏離。從史料方面來看，兩人之間的書信，或提及對方的文字，數量均不多，似乎印證兩人之間不存在著任公和康有爲、譚嗣同、黃遵憲 (1848-1905)、麥孟華 (1874-1915)、夏曾佑 (1862-1924) 那樣思想上與私交上的親密關係。¹⁰而且以現存史料而言，民國之後，梁啟超的文字之中幾乎看不到嚴復的蹤跡；嚴復在與友人通信中提及任公時，則全爲嚴厲批評，由此可以窺見兩人之私人交誼，可能相當淡薄。

本文主要將依賴嚴復與梁啟超之著作、書札中提及對方的史料與相關文獻，來釐清雙方之友誼，並以此一個案反省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之間的交往、互動。

二、嚴梁之初識：戊戌變法前夕

嚴復與梁啟超的相識是在光緒 22 年 (1896) 夏、秋之際。¹¹在此之前梁

9 請見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黃克武，〈論李澤厚思想的新動向：兼談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的討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5 (1996)，頁 425-460。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公司，1998）。

10 在最近出版的《嚴復合集》中有三封嚴復致梁啟超函，然此三封信的內容疑點重重，疑為偽作，故本文不擬引用。見王慶成、葉文心、林載爵主編，《嚴復合集》（台北：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冊 5，頁 88-90。筆者將另行撰文，對此三封信詳加考證。

11 本文之年月日，依歷史情景，在清季用陰曆，民國之後用陽曆。中國紀年之後再附西元紀年。

啟超已讀過嚴復於光緒 21 年（1895）在天津《直報》所發表的〈原強〉、〈闢韓〉等文，卻未曾謀面。光緒 22 年（1896）3 月，因強學會被查禁，梁啟超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開始與黃遵憲、馬良（相伯，1840-1939）、馬建忠（眉叔，1845-1900）兄弟等人交往，7 月任公與汪康年（1860-1900）、黃遵憲（1848-1905）、吳德瀟（1848-1897）、鄒凌瀚等創辦《時務報》。¹²

嚴、梁訂交的牽線者之一是黃遵憲。黃遵憲與嚴復相識大約是光緒 21 年（1895）7 月，黃赴北京參加強學會之後的事，¹³光緒 22 年（1896）夏末，黃遵憲赴天津，將他與任公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之事詳細地告訴嚴復，也趁機尋求嚴復的支持。該年 8 月 18 日，嚴復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與梁啟超，從信中「穰卿進士、卓如孝廉均鑑」的稱謂，以及「前寄一函，想經偉照」的內容，可以推想此時兩人初識，且已有書信上的聯繫。在此封信中嚴復表示願以具體行動支持《時務報》：

昨公度觀察抵津，稔大報一時風行……使中國而終無維新之機，則亦已矣；苟二千年來申韓斯高之法，熄於此時，則《時務報》其嚆矢也。甚盛！甚盛！寄上匯票百元，到時乞與察入，附據。區區不足道，聊表不佞樂於觀成此事之心云爾。¹⁴

《時務報》館後來收到了嚴復捐贈的 100 銀元，在光緒 22 年（1896）9 月初一出版的《時務報》第 7 冊，刊登「嚴又陵觀察助銀一百元」的消息。¹⁵

嚴梁訂交的另一個牽線人是嚴復的好友馬良、馬建忠兄弟。光緒 3 年（1877）嚴復赴英留學之時，馬建忠因李鴻章選派，以隨員兼法文翻譯身份同行，與嚴同船赴歐，馬建忠後進入巴黎政治學堂，修習國際法與外交，光緒 6 年（1880）3 月返國。¹⁶在歐期間嚴復與馬建忠，因為郭嵩燾與李鳳苞的

12 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53。

13 〈黃公度先生年譜〉，收入黃遵憲著，錢仲聯箋註，《人境廬詩草箋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3），頁 50。

14 《嚴復集》，頁 505。

15 時務報館編，《時務報》（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冊 7（1896），頁 479。

16 陳三井，〈略論馬建忠的外交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 下（1972），頁 544-546。

關係，也曾偶爾見面。¹⁷馬良與馬建忠均熟悉西方語文與洋務，並與李鴻章關係密切。¹⁸丁文江所編任公年譜長編引〈時務報時代之梁任公〉一文，即記載任公因馬氏兄弟的介紹，認識了當時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教書的嚴復：

丙申七月，《時務報》出版，報館在英租界四馬路石路，任兄住宅在跑馬廳泥城橋西新馬路梅福里，馬相伯先生與其弟眉叔先生同居，住宅在新馬路口，相隔甚近，晨夕相遇從。麥孺博於是年之冬亦由廣東到上海，與任兄及弟三人，每日晚間輒過馬先生處習拉丁文。徐仲虎建寅、盛杏孫、嚴又陵、陳季同及江南製造局、漢陽鐵廠諸公，與乎當時之所謂洋務諸名公，皆因馬先生兄弟而相識。¹⁹

嚴梁初識之後雙方繼有書信往還。光緒 22 年 9 月 2 日梁啟超在寫給嚴復的信中十分稱讚嚴著〈原強〉一文，也告訴嚴復他正跟馬建忠學拉丁文，並希望嚴復能挑選幾篇稿子交《時務報》發表。²⁰嚴復則在回信中予以勉勵，「從馬兄眉叔習拉丁諾文，甚感甚感！……以中年而從事西學者，非絕有忍力人，必不能也。在他人，僕固未嘗慫惥之，至於足下，則深願此業之就」，並在同一封信表示《天演論》手稿已完成，寄請任公指正，而〈原強〉一文「自覺不成一物……擬更刪益成篇，容十許日後續呈法鑒」。²¹後來不知何故《時務報》沒有刊登〈原強〉，僅於 23 冊（光緒 23 年 3 月 11 日發行）轉載了〈闢韓〉一文，還引起了激烈的論辯。²²

17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4），頁 659。光緒 4 年（1878）6 月 19 日，嚴復隨李鳳苞赴巴黎時，曾與馬建忠一起參加李鳳苞的晚宴。

18 朱維錚，〈近代中國的歷史見證一百歲政治家馬相伯〉，收入氏著，《求索真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391-447。

19 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台北：世界書局，1972），頁 33。

20 《嚴復集》，頁 513-4。

21 《嚴復集》，頁 515。〈原強修訂稿〉後收入光緒 27 年出版、熊季廉編《侯官嚴氏叢刻》之中，確定撰寫時間不詳，見《嚴復集》，頁 15-32。

22 有一些史料記載《時務報》刊登了〈原強〉一文，如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1896 年之下記載：「梁卓如、汪穰卿兩先生創辦《時務報》於上海，〈原強〉、〈闢韓〉等篇均又刊入」，《嚴復集》，頁 1548。此一記載是錯誤的，《時務報》僅轉載〈闢韓〉。張之洞讀到〈闢韓〉之後大怒，令屠仁守撰文反駁。有關〈闢韓〉與〈孝

光緒 23 年（1897）2 月，嚴復又寫了一封長達 21 頁的信給任公，對他在《時務報》的言論，²³特別是〈變法通義〉的主張提出批評，這封信原件不存，我們只能從任公的回信中約略地瞭解其內涵。他認為任公不當的言論將會對社會大眾產生重大的影響，「毫釐之差，流入眾生識田，將成千里之謬」，而且「苟所學自今以往繼續光明，則視今之言必多可悔」。這一封信在嚴梁關係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在此之前嚴復對任公多為讚賞、鼓勵，此後則轉為多所批評。

梁啟超收到來信之後，沒有立刻回復，至 3、4 月之間任公才寫了一封信給嚴復，該信即是後來收錄到《飲冰室文集》中的〈與嚴又陵先生書〉。²⁴從這一封信我們可以瞭解《時務報》時期任公思想狀態，以及嚴梁思想上的交會。

梁啟超對嚴復在信中的批評深表感激，「知天下之愛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但對於嚴復的批評，他提出了不少的辯駁。他也向康有為稟告此事，「嚴又陵有來書，相規甚至，其所規者，皆啟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學實精深，彼書中言，有感動超之腦氣筋者」，²⁵信中「所規者，皆啟超所知」之語氣，似乎顯示任公企圖向康表示嚴復的來信並沒有動搖他原有的思想路向。

其實這時任公思想已經在康、嚴之間游移，從他此時所寫的〈說群序〉

感屠梅君侍御辨闢韓書〉之間的爭論，可參見梁一模，〈自由と公私—清末における日本經由の「自由」論以前の「自由」論〉，《中國哲學研究》，號 10（1996），頁 22-24。王憲明，〈解讀「闢韓」—兼論戊戌時期嚴復與李鴻章張之洞之關係〉，《歷史研究》1999.4：113-128。

23 任公在《時務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多達 60 篇，詳細的篇名與期數可參閱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頁 54-56。

24 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文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1，頁 106-111。

25 光緒 23 年（1897）3 月 3 日致康有為函，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77。梁啟超在信中也表示要與康有為作進一步的質商，「欲質之先生，其詞太長，今夕不能罄之，下次續陳」，可見此時康梁在思想上還保持密切的關係。

明白可見：他一方面跟隨康有為的「以群為體，以變為用」的觀念，另一方面任公覺得康有為沒有將「群」的概念說得十分透徹，直到他讀了譚嗣同的《仁學》與嚴復的《天演論》，才「犁然有當於其心」。任公因而想將康有為的想法與《仁學》和《天演論》之觀點結合在一起，建立一個有關於群的理論。²⁶任公後來思想的發展與他在康、譚與嚴之間的取捨有密切的關係。

首先要指出的是，〈與嚴又陵先生書〉中嚴復與任公之差異，代表了戊戌變法前夕兩種對文化修改的看法。在目標方面，任公揭橥者乃康有為式的、奠基於孔子改制，並環繞著政治核心全面改組的激烈變革。誠如日本學者村尾進的研究所指出：任公「一再主張廢科舉興學校的〈變法通義〉，其實際所企圖的，並非在普及西洋方式的學校教育，而是在擴大以共同擁有基於孔子改制的解讀方法為起始的康學的講學之場所。要將康學的方法通過報刊，在不知不覺中滲透進讀者的腦中以養成風氣」。²⁷在方法方面，任公所宣揚的變法是以「陳勝吳廣」揭竿起義的精神，從各方面抨擊現況、強調變革的重要性，因此缺乏全盤規劃，也沒有分清楚各項改革的緩急先後。在思想風格上，此時康梁均傾向於徹底改造的轉化思想。

嚴復對此很不滿意，他不但批評任公立言草率，而且認為任公以康學為中心思想的改革方案具有「西學源於中國說」的特色，亦即「引中國古事以證西政，為彼之所長，皆我所有」，任公所撰〈古議院考〉，所謂「議院之名，古雖無之，若其意則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的說法，即為一例。²⁸嚴復認為這樣的方案無法認識到中國的病根與西方的優勢：「黃種之所以衰，雖千因萬緣，皆可歸獄於君主」、「中國歷古無民主，而西國有之」。²⁹

26 對〈說群序〉一文的分析請見張朋園，〈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現代化：嚴復、梁啟超的進化觀〉，頁202。

27 村尾進，〈《時務報》時期的梁啟超及其周圍的情況〉，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1），頁58。

28 《飲冰室文集》，1，頁94。

29 這一議題的辯論後來延續到次年9月任公發表的〈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時務報》，第41期），嚴復說「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則當夏商時含有種子以為起點，而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而入民」，任公以為「子之言未為當也」，他較樂觀地認為「民政不必待數千年前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

這一封信對任公思想產生不小的影響，當時他雖然還是「康學」的支持者，仍處在康陣營之內，但已種下後來思想變化的種子。根據蔣廣學的分析，這封信拉開了梁啟超與今文經學傳統的距離，促成後來梁與康的分道揚鑣，並破除了「中華中心」論，使任公更積極地引介西學。此後任公對中西文化的看法產生變化，他不再像康有為那樣，對西學的讚賞只以合於孔子的言論為限。具體而言，在歷史觀方面，任公開始不全然肯定「三世之義」、「孔子改制」，而從歷史進程的本身與自由精神的伸展，追索人類進化的規律，這也劃分三世說與演化論的界線。³⁰

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徵兆是有關「保教」的問題。保教一說源於康有為，在受到嚴復（以及黃遵憲）的質疑之後，³¹梁啟超開始反對此一說法。光緒 28 年（1902）任公在《新民叢報》第 2 期所撰〈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批評康有為之說，肯定思想自由的價值，即源於嚴復在信中所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難怪嚴復讀到這一篇文章之後非常稱許，認為「凡此皆非圓習拘虛者所能道其單詞片義者也」。³²後來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之中，清楚地敘述他在 26-30 歲之間（1899-1903）逐漸質疑康有為學說的過程：

啟超治偽經考，時復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謂然。

之所得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飲冰室文集》，2，頁 10。任公的論點有矛盾之處，他的〈古議院考〉無疑有尋找中國民主之胚胎的意涵，而嚴復有時亦偏向任公的觀點，他將西方自由民主與絜矩之道、老莊思想相提並論（見《自由的所以然》，頁 211-220），因此兩人觀點其實有共通之處。然而誠如張朋園先生的分析，〈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兩人的交鋒顯示任公在推理上仍偏向三世論，但嚴復則明顯立於進化論的立場。張朋園，〈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現代化：嚴復、梁啟超的進化觀〉，頁 200-202。

30 蔣廣學，〈梁啟超和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 1-22。

31 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頁 42。張朋園，〈黃遵憲的政治思想及其對梁啟超的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1969），頁 217-237。

32 《嚴復集》，頁 515-516。

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義，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駁之。³³

張朋園先生曾指出梁啟超在 1903 年言論轉變的過程中，黃遵憲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³⁴然而我們也不應忽略嚴復所起的作用。

從整體的思潮趨向來觀察，光緒 23 年（1897）嚴復與梁啟超書信的往來其實不只是兩人之間的事，而是代表了在戊戌變法前夕，天津、上海兩地維新人士之間的交往。嚴梁兩人之關係要放在此一框架來理解。上海的維新人士以《時務報》為核心，天津則以嚴復為首，再加上王修植（1860-1900，天津北洋大學堂總辦）、夏曾佑（1863-1924，天津育才學堂總辦）、杭辛齋（1869-1924）等人。³⁵嚴復寫給梁啟超的信，寄出之前，也曾給王、夏等人過目。上文提及嚴復致梁啟超的 21 頁長信寄出之後，任公沒有立刻回答，在這期間王修植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希望任公對「吾黨切磋之意」早做回覆，而且「當論是非，不當爭勝負」：

卓如近復何往？前者又陵先生貽書相規，此亦吾黨切磋之意，不可久不報。弟謂吾黨建一業、白一議，但當論是非，不當爭勝負。論是非者，文明之事；爭勝負者，土蠻之習也。

3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中華書局，1974），頁 61、63。

34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二版），頁 129。張朋園，〈黃遵憲的政治思想及其對梁啟超的影響〉。黃梁關係與嚴梁關係形成一個有趣的對比，黃嚴均批評梁過於激烈，但手法不同。誠如張朋園先生所指出的梁視黃為師友，他以正面的鼓勵、婉轉的勸阻，影響梁改變態度，使他從激進變為漸進。嚴則以梁的長輩自居，他對梁的譴責較為直接，這也影響到兩人之間的關係。

35 夏曾佑在光緒 22 年冬天至天津，與嚴復成為密友，「到津之後，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輒過談，談輒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弟在津與又陵、志梁、苑生、慕韓諸公建一學會，專譯西人新學之書，不作別事，不立名目……明年開會」，《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1324-1325。夏與梁啟超、譚嗣同、汪康年均為好友，是津滬士人相互聯繫的關鍵人物。杭辛齋參與《國聞報》一事見《嚴復集》，頁 356。

這一封信註明為「十五日」，可能是光緒 23 年（1897）3 月 15 日。³⁶不久，任公回信寄達嚴復之手，嚴復也將此信與天津友人分享。王修植再度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又談到「但宜論是非，不宜爭勝負」，而且強調，以此精神為基礎，雙方才能夠「同舟共濟」：

卓如與又陵書，弟等均讀過。其苦心高誼，亦為同志所諒，然其持論，亦仍不免有主張之處。弟以為吾黨但宜論是非，不宜爭勝負，持此宗旨，方是同舟共濟之誼也。³⁷

從信中「然其持論，亦仍不免有主張之處」似乎透露天津的這一批人對於任公的回應不甚滿意。但雙方的關係仍然繼續維繫，在同一封信中王修植和汪康年談到將在天津創辦《國聞日報》與《國聞彙編》，希望能與《時務報》的代表相磋商：

前奉手示，知從者將次來津，是以未及奉復，以何因緣又復遲遲？……弟日來與又陵、穗卿商，擬在津門亦開一館，一切體例略依尊處，稍微變通，急待從者之至，相與斟酌。³⁸

我們不確定《時務報》是否立刻有人來津洽談，僅知道在戊戌變法之前，上海、天津之間維新人士，因為合作辦報紙，一直維持密切的關係。例如《時務報》在創刊之初就曾將宣傳文案〈時務報啓〉二十本，交王修植，請他轉發同仁。³⁹《時務報》在天津的經理人後來即由王修植的表兄弟「西學官書局陸汲甫茂才」擔任，陸氏定期將天津所收到的《時務報》「報資」寄交上海。王還向汪康年表示此人「甚為可靠」。⁴⁰王修植與嚴復也承諾將不計稿酬，為《時務報》撰寫論說：

貴館論說如有應付不及之處，儘可由敝處每月寄數次。弟等當與嚴

36 《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78。

37 同上，頁 78-79。

38 同上，頁 78。

39 同上，頁 77。

40 同上，頁 80。

又老勉力為之，以副雅屬。至每文給值若干，大可不必，此非市道交也。⁴¹

總之，天津的《國聞日報》與《國聞彙編》就在津滬士人合作的氣氛之下，於光緒 23 年（1897）10 月初一創刊。在創刊之前（7 月 25 日），嚴復、夏曾佑與王修植又聯名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梁啟超與麥孟華（孺博），希望在《時務報》上刊登〈國聞報啟〉，並請求《時務報》館能協助《國聞報》在南方各省的發行工作，這時黃遵憲也時常往來津滬，從事雙方之間的溝通工作：

上月托公度觀察袖呈〈國聞報啟〉一通，求登貴報，俾我下乘，附驥而行，諒荷垂察。……現在資本已集，印機已購，開辦之期即在來月；伏乞將前寄啟文趕為登錄。將來出報之後，南中各省埠，尚擬依附貴館派報處代為分送；素紳公誼，當亦樂觀其成也。⁴²

8 月初一汪康年收到信之後，立刻有所行動，並在 8 月 11 日出版的《時務報》第 38 期中刊登「本期附送天津國聞報館啟」。然而令人訝異的是《時務報》卻沒有協助《國聞報》的發行工作。根據光緒 24 年（1898）2 月初 7，王修植致汪康年函，《國聞報》去年在上海委託《新聞報》館代銷，津滬雙方之間的合作似乎不那麼順利。⁴³

無論如何《國聞報》在光緒 23 年（1897）10 月初 1 正式出刊，在〈國聞報緣起〉一文，編者表示該報仿英國《太晤士報》之例，宗旨為「通上下之情」與「通中外之故」，而其緣起則受到《時務報》等報紙的鼓勵：

自上年今大冢宰孫公奏設《官書局匯報》於京師，而黃公度觀察、梁卓如孝廉、汪穰卿進士繼之以《時務報》，於是海內人士，似稍稍明於當世之務，知四國之為矣。踵事而起者，乃有若《知新報》、《集成報》、《求是報》、《經世報》、《萃報》、《蘇學》、《湘學》

41 同上，頁 82。

42 《嚴復集》，頁 506。

43 《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82。

等報……雖復體例各殊，宗旨互異，其於求通之道則一也。⁴⁴

至光緒 24 年（1898）初，《國聞報》的發行遭遇困難，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缺乏採訪人才，導致新聞來源不足。王修植說「《國聞》訪事人亦無好手，均係敷衍角色。京中時有重大新聞，或係得自西人，或係得之交好，亦無一定也」。⁴⁵另一個問題是缺乏翻譯西文的好手。嚴復透露：「《國聞報》館曾將原文西報分與此地學生教習等翻譯，而其中須重行刪改者，十人而七八」，可見學生翻譯的文章最後還需偏勞嚴復再作校閱。⁴⁶總之，光緒 24 年（1898）初《國聞彙編》停刊，《國聞日報》則繼續發行，每天的銷路只有 1500 張，此一數字遠遠不如《時務報》上萬份的發行量。⁴⁷這時王修植只好請求汪康年協助「推廣銷路」：

《國聞》館所求於左右者，不在幫助資本，而在設法推廣銷路。……能如此，則《國聞》受施多多矣。⁴⁸

王修植甚至請汪康年幫忙，希望請求張之洞模仿《時務報》、《知新報》之前例，「通飭各屬士商看報」，信尾還表示「嚴復附筆致候」。⁴⁹

這些請求幾乎都落空了，⁵⁰這顯然是因為當時《時務報》內部發生紛爭，梁啟超與汪康年意見不合、梁啟超、麥孟華與章炳麟也「輒如冰炭」，黃遵憲則「幾與汪穰卿決裂」；光緒 23 年（1897）秋天，黃遵憲、梁啟超乃先

44 《嚴復集》，頁 453。

45 根據汪大燮至汪康年函，「《國聞報》請人法最妙，所請即《泰晤士報》館所請之人……」，《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784。

46 《嚴復集》，頁 528。

47 在光緒 22 年（1896）底，《時務報》銷售 7000 份，至 23 年 8 月增至 12000 份，年底略減，但還有 10000 份。《梁任公年譜長編》，頁 38。蔡樂蘇、張勇、王憲明，《戊戌變法史述論稿》（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頁 407。有關《時務報》發行量，可參閱閻小波，《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傳播媒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頁 87-92。

48 《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82。光緒 24 年 2 月初 7 函。

49 《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82-83。

50 24 年 3 月 21 日出版的《時務報》57 期刊出《國聞報》啟事，通告設立上海分館，位於《時務報》館之內，這或許是嚴復等人所得到的唯一的幫助。

後赴湖南推行新政，倡辦南學會、時務學堂。⁵¹簡言之，光緒 24 年（1898）初《時務報》方面自顧不暇，並無餘力協助天津的朋友。⁵²

這時《國聞報》不但得不到上海方面的援助，還受到政府的壓力。光緒 24 年（1898）2 月 29 日王修植致汪康年函中，沮喪地表示「日來心緒惡劣」，因為「此間館事頗發阻力，總署已具稿，將奏請北洋封禁」。在這同時，夏曾佑寫給汪康年的信也提到，2 月底、3 月初之時，《國聞報》館受到各種壓力，因此只好將報館賣給日本人，「與東鄰矢野[文雄]君相商，借作外援，使得保全自主」。⁵³3 月 6 日起，《國聞報》改由日人西村博接辦，加印「明治」年號。⁵⁴夏曾佑並表示《時務報》所需要的文章，「嚴老近無暇，弟亦無暇，菟生方作之，日內想可寄上」。⁵⁵

夏曾佑所說「嚴老近無暇」，主要是因為當時《國聞報》館正承受「政府阻力」，嚴復被人指控「與外人勾串」，光緒亦得知此事。⁵⁶閏 3 月 13 日，上諭指示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1830-1908）調查《國聞報》館現辦情形。4 月 19 日王文韶調查之後秉告「查無其事」，但仍「諭斥嚴復並學堂學生等，嗣後不得再有隻字附登館報，以自取戾」。⁵⁷後來嚴復在 7 月 29 日蒙光緒召見，光緒還問他與《國聞報》之關係，嚴復輕描淡寫地回答：「臣非該館主筆，不過時有議論，交於該館登報耳」。⁵⁸

當《國聞報》被人指控之時，康有為在京師發起保國會。閏 3 月 15 日，

51 〈黃公度先生年譜〉，頁 56。

52 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81-183。

53 《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1329-1330。

54 李斌，〈嚴復與《國聞報》〉，《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44。

55 《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1239。

56 夏曾佑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表示彈劾者是李木齋（盛鐸，1858-1935），「敝處……近日又為李木齋所劾，其摺中劾報館一層，不過陪筆，而實則劾又陵」，同上，頁 1334。嚴復在寫給熊純如信中也提到此事：「《國聞日報》見於戊戌，……李木齋當日不知受何人之嗾，乃以白簡相加，復於召見時，清德宗尚以此為問也」，《嚴復集》，頁 653。

57 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繫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 677。

58 《嚴復集》，頁 61。

任公寫信給夏曾佑，一方面談到保國會受人參劾，另一方面則請夏將〈保國會章程〉刊登於《國聞報》之上。閏 3 月 17 日，《國聞報》登出〈保國會章程〉三十條，由此可見天津士人對康梁改革主張的支持。⁵⁹其後《國聞報》對保國會的活動，作持續的報導。⁶⁰嚴復也撰寫〈有如三保〉、〈保教餘義〉、〈保種餘義〉等文與之呼應。⁶¹

因為津滬士人相互合作的關係，在這期間嚴復等人密切地注意《時務報》內部的紛爭，6 月 3 日嚴復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說到自身的處境，並關心內鬥對汪的打擊：「《國聞報》被劾事已解矣。近聞御史宋伯魯奏請以《時務報》改為官報事已交孫五先生議矣，據有人言此舉乃報復，意欲使公不得主其局，不知曾聞否？」⁶²嚴復所說的心存報復之人很可能是指任公。這時《國聞報》發表了汪康年、黃遵憲與梁啟超相互攻擊的啓事。⁶³光緒 24 年（1898）7 月 10 日，《國聞報》又登出嚴復所撰寫的〈《時務報》各告白書後〉。當時曾捐 100 兩銀元贊助《時務報》的嚴復，深深感嘆上海維新之士無法合作。對於此事，嚴復較同情汪康年，而批判梁啟超、黃遵憲，認為他們奏請改為官報之舉是「借貴位尊勢以劫制天下」，與任公平日強調「憑公理以悅服人心」的論調不符：

公義捐款至萬餘金，《時務報》為公事，非私事矣，則何人實畀梁君以全權，使之以眾人之捐款為一家之芹獻，輒奏改公立民報為官報乎？……乃一旦志得，遂挾天子之詔，以令錢唐一布衣，非所謂變本加厲者耶？⁶⁴

這一件事情後來無疑地影響到嚴復對梁啟超的評價，也使兩人關係益為疏

59 《梁任公年譜長編》，頁 50。

60 李斌，〈嚴復與《國聞報》〉，頁 550。

61 《嚴復集》，頁 79-88。這三篇文章刊登於《國聞報》光緒 24 年 4 月 15-16 日、19-20 日與 23-24 日。

62 《嚴復集》，頁 507，此處繁年有誤，應為 6 月 3 日，非 5 月 3 日。

63 〈上海時務昌言報館告白〉，《國聞報》，光緒 24 年 6 月 24 日；〈上海時務報館告白〉，《國聞報》，光緒 24 年 7 月 1 日。

64 《嚴復集》，頁 494。

遠。⁶⁵總之，光緒 24 年（1898）6 月《時務報》停刊，《國聞報》則早在同年 3 月起歸日人經營，風格轉變。⁶⁶不久發生百日維新與戊戌政變，任公流亡日本。嚴復在事變之中行事低調，倖免於難。嚴梁關係至此暫時終止。

陳寅恪曾指出同光年間的維新變法有兩個源頭，一派以郭嵩燾、張之洞及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為代表。另一派以康有為為代表。前者主張漸進改革，後者則激烈地「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⁶⁷戊戌變法前夕是否有這兩源引起學界的一些討論。

從近世中國經世傳統來看，經世思想可以依賴兩組觀念，區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組是要求徹底改變而達到完全成功的「轉化思想」；以及主張逐步改善而肯定等級性成就的「調適思想」。第二組是主張「政治核心的改革」（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強調「政治核心之外的社會性行動」。拙文曾指出 17 世紀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經世思想為主張徹底改造政治核心的轉化思想；至 18 世紀因清人入主與人口增加，促使經世思想家關懷地方性、社會性事務，偏向政治核心之外的調適性行動；至 19 世紀，清政府逐漸衰微，環繞政治核心之改革的經世思想又逐漸抬頭，至戊戌變法而達到高峰。⁶⁸

戊戌變法前夕中國思想界主要即是主張「政治核心的轉化思想」與主張「政治核心的調適思想」盛行的時期。陳寅恪所說的兩源可以配合這兩類型的經世思想。康有為在中央所發動的全面性的組織改造無疑地屬於前者，⁶⁹

65 見嚴復致張元濟書，嚴復感嘆到「如此人尚可與共事耶？」《嚴復集》，頁 533。

66 光緒 24 年 11 月夏曾佑致汪康年函提到「報館王嚴均擬暫停，已有成議。（日人尚不甚願）」，見《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1338。25 年 1 月 18 日夏曾佑致汪康年函，談到《國聞報》賣給日本人之後的轉變，「國聞報館已認真賣與日人……而我輩昔日之地獄，一轉移間而為天堂，俛而思之，不覺大笑」，同上，頁 1338。

67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寒柳堂集》（台北：里仁書局，1985），頁 148-150。王焱，〈陳寅恪政治史研究發微〉，《自由與社群》（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 348。

68 請參見黃克武，〈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6（1987），頁 37-56。

69 墨子刻指出戊戌時期康有為的維新思想，突破了明清時期的溫和實在論（moderate realism），回復到明末清初，如黃宗羲等所倡導的改造政治核心的轉化思想。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90, 219-220.

而長沙與天津等地人士所從事的漸進性的改革，如陳寶箴父子推行的新政與嚴復在《國聞報》所揭橥的改革理念，則屬於後者。此外，童學琦、宋恕等人以《經世報》為中心的浙江變法士人也可以歸於強調「政治核心的調適思想」。⁷⁰至於梁啟超在《時務報》與湖南新政時期，顯然較傾向康有為模式，但在這其間他與長沙、天津（以及杭州）等地士人的交往，則埋下了東渡之後思想變遷的種子，終而導致脫離康有為轉化路線，親近嚴復的調適模式。

三、嚴梁「交鋒」：戊戌之後

從戊戌變法失敗、康梁流亡日本，一直到民國初年，嚴復與梁啟超之間有斷斷續續的來往。在這段期間嚴復對任公抱持一貫的批判態度，認為從《時務報》到《清議報》與《新民叢報》，他的思想風格、論政態度所引起的革命精神，是造成中國亂象的重要根源。從任公方面來看，光緒 29 年（1903）訪美歸來之後思想丕變，開始認真考慮激烈化言行所帶來的負面效果，也看到中國傳統與中西會通的正面意義。但嚴復顯然認為任公的個人改變無濟於事，因為他所帶起的革命風潮已經鑄成了大錯。

在《清議報》階段，嚴梁並無交涉，嚴復僅在與友人書信之中單方面地批判任公的觀點與作為。至《新民叢報》時期，雙方再度接觸，關係略為和緩，兩人對於西書翻譯問題，特別是《原富》、《群學肄言》有所討論。

此外，在任公返國之前兩人間有一些間接的交涉。如嚴復有關《老子》的言論，雖未明言，其矛頭其實指向在日本的任公。這樣的批評延續到民國初年，嚴復在民國 1-10 年（1912-1921）年間寫給他的學生熊純如的信函之中仍然多次批評任公。這些言論本來是私密性的，嚴復過世之後，熊純如將信交給學衡派的胡先驥（1894-1968），胡將其中的 80 封刊登於《學衡》第 6 至 12 期（1922-1923），嚴復這些想法才廣為人知。任公或許也讀到了這些文字，但很可惜我們無法得知他內心的反應。再者，在這期間兩人也有一些詩文上的應酬。

70 楊際開，〈宋恕變法理論與清末政治思想〉，《思與言》，39.4（2001），頁 151。

(一)、《清議報》階段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任公亡命日本，該年 12 月創辦《清議報》，主旨是「廣民智，振民氣」，這時任公對清廷極力抨擊，講破壞、談革命。⁷¹《清議報》館位於日本橫濱，報紙在日本發行，然仍能透過各種管道傳入國內。⁷²

任公東渡日本之初期，因為政治上的禁忌，嚴梁之間並無聯繫。戊戌政變後嚴復雖未受影響，卻深感「自危」。⁷³他曾撰寫〈戊戌八月感事〉，感嘆六君子之遭遇，因為擔心觸犯時忌，不敢公開發表，僅傳抄於親友之間，另外還有〈哭林晚翠〉、〈古意〉兩首，追念戊戌死難者林旭（1875-1898）。⁷⁴光緒 26 年（1900）嚴復寫給張元濟（1866-1959）的一封信即透露此一顧忌。嚴復聽說任公主編之《清議報》刊登夏曾佑的「吊（弔）六君子諸詩」，而且還署名，他很為當時擔任安徽祁門知縣的夏擔心：

竊謂穗兄曉人，決不當所為矛盾如是，身為州縣，名在禁書之中，有是理耶？不然，則出報者有意嫁禍穗兄而後出此；又不似，則斯言奚宜至哉？望台從就近一查，若果有此事，即宜馳書切戒穗卿，並屬其設法速止；徒禍身家，於時無毫末之益，即以正道言之，亦為違反也。⁷⁵

嚴復所說的可能是指《清議報》第 30 期上所刊登的〈弔六君子文〉，這一篇

71 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頁 140。

72 如夏曾佑多次寫信給汪康年，請他秘密地郵寄《清議報》。「《清議報》尚出否？若出，望源源寄來，然須慎密」（光緒 26 年 2 月 28 日）；「《清議報》望陸續（卅三起）寄來，然須封固，急須一看」（光緒 26 年 4 月 20 日收到）；「《清議報》補買二十二、二十七二本，以後從三十五起定長年。其三十七最要，望早寄來」。《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1356、1357、1961。

73 光緒 25 年正月 18 日，夏曾佑致汪康年函，提到「又陵甚自危」，《汪康年師友書札》，頁 1339。

74 《嚴復集》，頁 414、362-363。〈戊戌八月感事〉一詩也曾傳給任公，在《新民叢報》第 4 期（1902）登載〈飲冰室詩話〉，其中提及「嚴又陵哲學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詩才之淵懿，或罕知者。余記其〈戊戌八月感事〉一首……又綠珠詞（按即〈古意〉）一首……蓋哭林晚翠也」，頁 101。

75 《嚴復集》，頁 538。

文章其實並沒有署名，報上只寫「錄天津國聞報」。⁷⁶然而從嚴復對這一則傳聞的態度，可以想像當時他刻意地與任公保持距離。

嚴復與任公的疏遠不僅是因為政治因素，也因為他對《時務報》時期以來任公輕率、躁進的作風有所不滿。在百日維新期間，嚴復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就談到任公這方面的缺點，他說：「梁卓如……英華發露太早，正坐蘇子瞻〈稼說〉所指病痛」，此處所引的文章是蘇軾的〈稼說送張琥〉一文：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鉤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⁷⁷

嚴復的意思很清楚，任公的缺點是「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因此他對任公的期許是「博觀約取」、「厚積薄發」。⁷⁸

同樣的觀點也表現在嚴復寫給張元濟的一封信中。嚴復說任公在《清議報》上論點「令人意惡」：

京津稍復靜謐，無新聞可道者。每次見《清議報》，令人意惡。梁卓如於已破之甌，尚復嘵嘵，真成無益。平心而論，中國時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對山（按指康有為）等之罪過也。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輩雖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語；況雜以營私攬權之意，則其罪愈上通於天矣。近聞在東洋又與王小航（按王照）輩不睦；前者穰卿（按汪康年），後者小

76 《清議報》，第30期（1901），頁1961-1962。

77 蘇軾，〈稼說送張琥〉，《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339-340。

78 《嚴復集》，頁508。

航，如此人尚可與共事耶！⁷⁹

嚴復也明白表示他對康有為的言行均不苟同：「穗卿（夏曾佑）極袒對山（康有為），弟則自知有此人以來，未嘗心是其所舉動」。⁸⁰上述的批評可以代表嚴復對康梁一貫的評價，民國以後他與熊純如的通信之中，反覆地提到這些看法。

（二）、《新民叢報》時期

光緒 27 年（1901）11 月《清議報》停刊，任公再辦《新民叢報》，於光緒 28 年（1902）正月出版。《新民叢報》和《清議報》一樣，也是透過各種管道流傳國內。⁸¹這一階段嚴梁之間有較多的交往。茲分以下三方面敘述。

1. 《新民叢報》中對《原富》與《群學肄言》的評介

《新民叢報》出版之後，任公將第一至三期寄請嚴復指正。嚴復收到之後，仔細閱讀，對於任公又萌生了一些正面的觀感。他在回信中很高興地表示：任公的作品「辭意懇惻，於祖國若孝子事親，不忘幾諫，尤徵遊學以來進德之猛」。嚴復特別欣賞第一期之〈新史學〉，第二期之〈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與第三期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文。⁸²他甚至說〈新史學〉一文「尤為石破天驚之作，為近世治此學者所不可不知」。⁸³

79 《嚴復集》，頁 533（光緒 25 年 8 月 20 日）。有關汪康年與梁啟超在《時務報》時的爭執可參見廖梅前引書，與蔡樂蘇、張勇、王憲明，《戊戌變法史述論稿》，頁 408-450。王照（1859-1933），字小航，光緒 20 年進士，戊戌政變之際亡命日本。有關王照與康梁的衝突陳少白曾經目睹，1898 年時王照曾向陳少白抗議康有為的傲慢與專橫，蕭公權，《康有為思想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頁 23。

80 有關「對山」一稱呼的考證，請見蔡樂蘇，〈嚴復拒盧梭意在諷康、梁〉，《近代史研究》，1998：5，頁 34。

81 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說「〈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頁 62。

82 《嚴復集》，頁 515。

83 《嚴復集》，頁 551。

嚴復在讚許任公之餘，也針對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一篇評介嚴譯亞當·斯密《原富》（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的短文作一回應。嚴復的文章以〈與《新民叢報》論所譯《原富》書〉為題，登於《新民叢報》第 7 期。兩人的討論涉及文言與白話之爭，以及語言與「開民智」之關係等課題。宣稱「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梁啟超，⁸⁴在文中表示，《原富》一書美中不足之處是嚴氏的譯筆太過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而所譯的內容又是「理學邃贊」，所以嚴復所宣傳的「文明思想」不易為一般的「學僮」或「國民」所了解。嚴復回答說文字是表達思想與情感的工具，「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而中國歷史上司馬遷（145 B.C.-？）與韓愈（768-824）的文字最為優美，梁氏也常說戰國、隋、唐是中國學術最為燦爛的時代，所以嚴復覺得用此時之文體從事翻譯最為合適。嚴復並強調，此種學理邃贊之書，不可能讓每一個人都了解，他所期望的讀者不是一般學僮，而是熟讀古書的士人，如果因為不通古文而有所抱怨，那麼問題在於讀者，而不是譯者。⁸⁵

嚴復顯然非常堅持以文言來開民智的觀點，他在寫給張元濟的信中還談到此事，「《叢報》於拙作《原富》頗有微詞……顧言者日久當自知吾說之無以易耳」。⁸⁶總之，任公的批評沒有帶來任何的改變，嚴復後來出版的幾本譯著，仍繼續維持以桐城古文翻譯西書的風格。

光緒 29 年（1903）《新民叢報》中又刊登了一篇介紹嚴復譯作的文章，這是在第 40、41 期中有關《群學肄言》的短文。此篇未署名的文章很可能是由任公的手筆。文中徵引了嚴復在該書自序中的一段話：

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謔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擡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為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

84 《清代學術概論》，頁 62。

85 《嚴復集》，頁 516。

86 《嚴復集》，頁 551。

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為愈乎。

接著作者表示：

其言之所以箴吾黨者至矣。雖或不盡適於今日之事勢，而苟以愛國自勗者，亦烏可不三復也。……此其言誠切中人人通病，論學論事之有督誤，罔不由此。⁸⁷

此文刊出時，任公已訪美歸來，思想發生變化。這一篇文章正可以表現筆者在前文所謂任公「向嚴復模式靠攏」的現象。在《新民叢報》第38、39號，任公登出〈論私德〉與〈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接著在40、41又刊登了〈論私德之續〉，這一系列作品象徵著任公對先前激進的言行有所反省。難怪在同一期中介紹《群學肄言》的文章，他對於嚴復批評「淺謬剽疾」的用心，表示同感。

在同一期還刊登了任公的〈答飛生〉一文，也顯示出同樣的思考發展的方向。飛生是蔣百里（1888-1938）的筆名，他在《浙江潮》之上發表〈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批評任公的〈新民說〉，他主張先鼓動民氣，推翻當時的滿人政權，再圖新民，他認為「自事實上言，則必有新政府而後可得新民也」。蔣百里並援引甲午戰後嚴復〈原強〉中的觀點，強調以「一震」鼓動「民氣」以求革新：

夫變俗之事，亦未始不可期，雖然有其道焉，則有一震撼雷霆之舉，足以使沈睡之腦一震而耳目能一新是也。善夫嚴子〈原強〉之言也，歸其本於智、德、力，而救急則歸於一震；蓋深知智、德、力之進之有道，而救時之要道在是也。新民氏之宗旨與嚴氏同，而於篇末一節未有留意焉，所以言焉而不免有病也。⁸⁸

上文所謂「新民氏之宗旨與嚴氏同」是一個很敏銳的觀察，顯示嚴復與梁啓

87 《新民叢報》，期40-41，頁150-151。

88 王忍之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0），卷1下，頁520。

超均致力於「救急」與「歸本」。但蔣百里與任公對嚴復的觀點有不同的認識，蔣百里偏向先救急之後再歸本（這或許較接近嚴復早期的觀點）。任公此時則對於「救急」與「歸本」有新的思索。他認為兩者各有其作用，應用之時要謹慎小心。任公說：「吾嚮者固亦最主張『鼓氣』主義，乃最近數月間，幾經試驗，而覺氣之未盡可以待」。他同意鼓氣主義可偶爾用之，但覺得更為關鍵的是提昇人民的智德力：

氣雖揚上，而智德力三者不能與之相應，則不旋踵而癟矣……今日欲改造我國家，終不得不於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養，苟非爾者，非惟建設不可期，即破壞亦不可得也，而偏持鼓氣主義，其結果也，則往往於養成德智力三者之事業，無端而生出許多魔障。⁸⁹

任公這一段話所針對的不只是蔣百里，還包括當時在日本「專以鼓氣為唯一法門」的革命黨人，也標幟著任公從轉化轉向調適的思想變遷。此一觀點與嚴復所揭露的調適性的立場已經非常類似了。

2. 嚴復批判東學

嚴梁之間有關翻譯的討論也涉及清末民初兩種不同的翻譯工作。如前所述，嚴復係直接翻譯西書，任公等人則透過日本學術界，間接來認識西方。後者即嚴復所謂的「東學」。

嚴復對於梁啟超式的「東學」深表不滿。在這一時期寫給門生熊季廉的信中多次表達此一觀點：

至一切新學，則不求諸西而求於東。東人之子來者如鯽；而大抵皆濫竽高門，志在求食者也。吾不知張南皮輩率天下以從事於東文，究竟捨吳敬恒、孫揆陶[鈞]等之驕囂有何所得也？⁹⁰

89 《新民叢報》，期 40/41 合刊（1903），頁 161-162。

90 《嚴復合集》，冊 5，頁 19。（光緒 28 年 8 月 12 日）孫揆陶應為孫揆鈞（一作均，

須知今日天下洶洶，皆持東學；日本人相助以扇其燄……往者高麗之事起於東學，中國為之續矣。可悲也夫！復願季廉必無以東學自誤也……上海所賣新翻東文書，猥聚如糞壤。但立新名於報端，作數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間，便得利市三倍。此支那學界近狀也。

91

嚴復在光緒 31 年（1905）底寫給曹典球的信中也是大力抨擊東學，他說：

大抵翻譯之事，從其原文本書下手者，已隔一塵，若數轉為譯，則源遠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頗怪近世人爭趨東學，往往入者主之，則以謂實勝西學。通商大埠廣告所列，大抵皆從東文來。夫以華人而從東文求西學，謂之慰情勝無，猶有說也；至謂勝其原本之睹，此何異睹西子於圖畫，而以為美於真形者乎？俗說之諱常如此矣！⁹²

這幾封信顯示嚴復將中國走向「激烈化」的原因，一方面歸咎於《時務報》以來康梁的鼓動，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張之洞等人所鼓勵的「東學」，再加上日本人「相助以扇其燄」所造成的。他感嘆地說以「東學」為「新學」的結果只是造就了一些像吳敬恆、孫揆鈞等鬧學潮的學生，以及「輕佻浮偽，無縝密誠實之根」的學風。嚴復對東學的批評也間接指向任公。簡言之，他認為任公的缺失與當時「東學」所導致偏頗學風有密切的關係。

3. 嚴復評點《老子》以暗諷任公

庚子事變之後嚴復離開天津，避難上海。是年秋天熊季廉在好友陳三立

1856-1930) 之誤，此處所指的是 1902 年成城學校入學事件，吳敬恆與孫揆鈞糾眾向駐日公使蔡鈞請願，後被遣送回國。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 20-22。

91 《嚴復合集》，冊 5，頁 21-22。（光緒 29 年 1 月 3 日）

92 《嚴復集》，頁 567。

的鼓勵之下「先以書自通，繼而執贊造吾廬，求得著籍爲弟子」。⁹³從光緒 26 年（1900）至 32 年（1906）熊去世爲止，嚴熊之間有非常密切的來往。熊季廉對嚴復的仰慕其實有跡可尋，他早年「好桐城方氏、湘鄉曾氏所爲書」，⁹⁴後來熊又受陳三立影響（三立與其父寶箴均與郭嵩燾往來密切），思想傾向與嚴復非常接近。⁹⁵

熊季廉與嚴復的論學中有一部分是關於《老子》，其內容於光緒 31 年（1905）在東京出版，名爲《侯官嚴氏評點老子》。根據最近的研究，此書的目的之一，即針對任公對老子學說的看法。⁹⁶

光緒 29 年（1903）底、30 年（1904）初嚴復與熊寄廉的書信多次提及《老子》。嚴復是在熊季廉的請求之下，在熊所批注王弼註《老子》之上再做批注，後來數量日益增多，而成爲嚴氏評點。不過在目前的刊本之中，還保留了不少熊季廉的看法，可窺見其雛形。⁹⁷嚴復說：

前者在都，蒙以《道德經》示讀，客中批覽，輒妄加眉評。我輩結習，初何足道。乃執事持示義寧（按指陳三立），以為得未曾有。遂復郵寄，囑便卒業。春夏之交，南奔猝猝，無須臾之間。近者乃踐此諾，碌碌無異人者。然公等嗜痂，茲持寄趙。義寧如有所教，乞告我也。⁹⁸

93 《嚴復集》，頁 273。嚴復與陳三立有許多共同的師友，如郭嵩燾與陳寶琛，但嚴陳雙方一直不曾見面，光緒 29 年（1903）1 月 3 日，他寫給熊季廉的信中說：「義寧公子，復夙所欽遲，而緣慳一面，其節操真足令人敬嘆」，《嚴復合集》，頁 22-23。

94 陳三立，〈南昌熊季廉墓志銘〉，《散原精舍文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 90。

95 陳三立鄉試時的座師為嚴復同鄉陳寶琛。再者，陳三立很欣賞嚴復的翻譯，他在讀過嚴譯《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之後，曾賦詩記事。潘光哲，〈陳三立傳〉，《大陸雜誌》，93.3（1996），頁 2、22。

96 蔡樂蘇，〈嚴復為何評點《老子》〉與戚學民，〈嚴復譯著與梁啟超思想之關係〉，《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頁 212-234、269-290。

97 見《嚴復集》，頁 1085、1090、1096、1097。

98 《嚴復合集》，冊 5，頁 47。

以上的敘述和熊季廉為《侯官嚴氏評點老子》所寫的序文，頗為符合。此一序文在出版之前曾由嚴復仔細增刪。⁹⁹

根據蔡樂蘇的分析，嚴復評點老子所針對者乃當時人們對老子與自由思想的雙重誤解。首先有些人將中國的衰落歸咎於老子：「優時之士，恫宗國顛危，求其故而不得，則一歸咎於老子」；¹⁰⁰再者「近世新學之士，一邊於西國自由之說，深表同情；一邊於本國黃老之談，痛加詆毀，以矛陷盾，杳不自知。篤而論之，此等論家，於兩義均無所知而已」。¹⁰¹如果比對當時思想界，一方面同情自由學說，另一方面批評老子思想的人，梁啟超乃是其中之一。

在《自由書》中，任公說明該書的主旨肯定自由，「西儒約翰彌勒曰，人群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在同書之中，任公又大肆批評老子。「老子曰，不為天下先。蓋為天下先者，未有不敗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敗而憚先，天下遂以腐敗不可收拾……然後嘆老氏之學之毒天下，未有艾也」。¹⁰²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任公也說「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而在其私利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老學之毒，雖不止魏晉六朝，即自唐以後至今日，其風猶未息」。¹⁰³由此可見對任公來說，西方自由的概念與老子「不為天下先」與「私利主義」的學說是截然相對的。前者代表「雄奇進取」，積極爭取自我權益，並能以獨立自主的精神，不侵人之自由，也不放棄自身之自由；¹⁰⁴後者則是畏懼退縮，只顧自身的利害關係。任公一方面批評老子思想與西方自由、權利觀念的差異，另一方面也認為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保民」、「牧民」，與西方的民主政治有本質上的不同，「以保民牧民比之於暴民者，其手段與用心雖不同，然其為侵民自由權則一也」。¹⁰⁵總之，任公一方面強調

99 《嚴復合集》，冊 5，頁 49-50。

100 〈熊元鍔序〉，《嚴復集》，頁 1102。

101 《嚴復集》，頁 1279。

102 梁啟超，《自由書》（台北：中華書局，1979），頁 1-3。

103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台北：中華書局，1974），頁 59-62。

104 梁啟超，《自由書》，頁 40。

105 梁啟超，《自由書》，頁 40-41。

西方自由民主觀念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則批判中國傳統中缺乏自由、民主的嚴重缺失。

嚴復對上述的觀點提出批評，在《老子》評點之中，他認為老子思想不是消極無爲，而是具有積極努力的精神。在上篇第 33 章，「強行者有志」之上，他說：「惟強行者為有志，亦惟有志者，能強行」。「強行者」即是目前中國所需要的「志士」。¹⁰⁶嚴復還認為黃老之道配合民主，「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爲而無不爲」。¹⁰⁷他又說老子所謂「小國寡民」的境界，「君不甚尊，民不甚賤」，正是孟德斯鳩《法意》所說的民主。¹⁰⁸對嚴復來說道家思想與西方「自繇」也是相配合的，他認為老子所說的「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中的「安」即是「自由」；¹⁰⁹莊子、楊朱的學說是西方的「個人主義」。¹¹⁰簡言之，嚴復認為老子思想配合西方自由民主，因此中國傳統中的一些部分與現代西方不相矛盾。

如果將嚴復評點老子的觀點與光緒 23 年（1897）嚴梁有關〈古議院考〉的討論聯繫起來看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義的對照。在光緒 23 年（1897）的通信之中，任公強調西方民主與中國古代制度的關連性；這一觀點受到嚴復「中國歷古無民主，而西國有之」的批評。任公受到嚴復的指正之後，思想逐漸改變，放棄了〈古議院考〉那樣的觀點。然而有趣的是，至光緒 31 年（1905），嚴復卻又採取了一個類似任公早期的觀點，看到中西之間類似之處，再由此批評任公在《自由書》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對道家與西方自由學說的認識。這時他不滿任公批判傳統的立場，轉

106 嚴復，《嚴幾道先生評點老子道德經》（台北：廣文書局，1961），頁 33。

107 《嚴復集》，頁 1079。

108 《嚴復集》，頁 1091。

109 《嚴復集》，頁 1090。

110 嚴復對楊朱的看法與任公的觀點其實有相近之處。任公說楊朱所謂「人人不損一毫，抑亦權利之保障也」，但任公又批評楊朱「彼知權利當保守而勿失，而不知權利以進取而始生。放佚也、媿樂也、任運也、厭世也，皆殺權利之創子手也」，梁啟超，《新民說》（台北：中華書局，1978），頁 36。嚴復的觀點請見《自由的所以然》，頁 211-220。

而強調中國傳統之中存有與西方價值相契合、相發明之處。¹¹¹這一次思想的交鋒再次地顯示，嚴復是從調適性、會通中西的立場，來批評任公（1903 年之前），以及其他更激烈的革命派，所抱持較為轉化性的，以西法來轉變中國的觀點。這也顯示嚴復一方面不夠自覺到前後論述的差異，另一方面他又不理會光緒 29 年（1903）之後任公轉向調適的思想變遷。難怪當時人在東京的任公無言以對。

（三）、辛亥革命之後嚴梁的交往

辛亥革命之後任公結束了流亡生活，返回中國。嚴復則受到袁世凱的任命，於民國元年 2 月出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5 月再改為北京大學校長。民國元年（1912）12 月任公主編《庸言報》，次年五月，進步黨成立之後，此報成為進步黨的機關報。¹¹²民國 2 年（1913）年間，任公寫信請嚴復為《庸言》寫文章，嚴復乃撰〈民約平議〉一文，登於民國 3 年（1914）2 月，《庸言》25、26 期合刊之上。¹¹³這篇文章在論點上延續了光緒 32 年（1906）所寫的《政治講義》一文中的觀點，¹¹⁴代表了嚴復對辛亥革命與民初政局的看法，也暗藏了對任公思想中激烈面的針砭。

嚴復對盧騷思想一直抱持著批判的態度，認為這一想法促成辛亥革命與共和初期的動亂，「自盧梭《民約》風行，社會被其影響不少，不惜喋血捐生

¹¹¹ 有關嚴復對老子的觀點，請見拙著，〈嚴復晚年思想的一個側面：道家思想與自由主義之會通〉，《思與言》，34.3（1996），頁 19-44。

¹¹²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 207。

¹¹³ 嚴復在寫給曹典球的信中談到感謝憲法研究會同仁邀稿，「昨承損書，諭以憲法研究會同仁擬輯雜誌，不以復為固陋，令其有所撰述……曩為《平報》社所剽，略有著筆，竟不知更成何語。至於《庸言報》，則於任公雖有諾責，終無所就，恐足下雖載酒相遇，亦不能使槁木死灰復行牙柄」，顯示在撰寫此信時，〈民約平議〉一文，尚未完成，故此信應為 1913-1914 年所撰，《嚴復集》編者誤為 1917 年。該信中所談到的「憲法研究會」應為成立於 1913 年的憲法研究會（亦稱「研究憲法委員會」），而非 1916 年 8 月研究系所成立的憲法研究會。〈與曹典球書〉見《嚴復集》，頁 575。

¹¹⁴ 《政治講義》，光緒 32 年（1906）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入《嚴復集》，頁 1241-1316。嚴復在《政治講義》中對盧騷思想的批評，請見《自由的所以然》，頁 276-290。

以從其法，然實無濟於治」。¹¹⁵誠如筆者在《自由的所以然》書所做的分析，在西方民主傳統上，嚴復選擇的是英國彌爾式的調適思想，而反對以民約論為基礎的法國盧騷式的轉化思想。¹¹⁶嚴復為《庸言》寫這一篇文章自然有其一貫的用意，他認為盧騷思想的流行與康、梁等人的宣傳有密切的關係。在這方面嚴復沒有公開地說，只在他寫給熊純如的信之中，忿忿不平地指出：

康梁生長粵東，為中國沾染歐風最早之地，粵人赴美者多，赴歐者少，其所捆載而歸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紀革命獨立之舊義，其中如洛克、米勒登、盧梭諸公學說，驟然觀之，而不細勘以東西歷史、人群結合開化之事實，有百利而無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謬不然乎？¹¹⁷

梁任公筆下大有魔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故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為天經；倡暗殺，則黨黨以暗殺為地義。溯自甲午東事敗衄之後，梁所主任之《時務報》，戊戌政變後之《清議報》、《新民叢報》及最後之《國風報》，何一非與清政府為難乎？指為窮凶惡極，不可一日復容存立。於是頭腦簡單之少年，醉心民約之洋學生，至於自命時髦之舊官僚，乃群起而為湯武順天應人之事。¹¹⁸

嚴復與熊純如通信中，梁啟超出現十餘次，他的形象幾乎都是負面性的。¹¹⁹在嚴復的記憶之中，任公早在《時務報》階段就已經誤入歧途，嚴復在光緒 23 年（1897）寫給他的信，即針對這種激烈化、躁進輕浮的思想模式有所批評，可惜任公卻無法接受他的「逆耳之言」。民國 5 年（1916）9 月 22

115 《嚴復集》，頁 614。

116 《自由的所以然》，頁 278-289。

117 《嚴復集》，頁 648。

118 《嚴復集》，頁 645-646。

119 最早注意到嚴復在與熊純如函中批判任公為「禍魁」的人是周振甫，他在民國 25 年（1936）所撰寫的《嚴復思想述評》（台北：中華書局，1987）一書，仔細地描寫了這些批評，見頁 279-287。蔡樂蘇，〈嚴復拒盧梭意在諷康、梁〉一文也曾詳細分析嚴復書信之中對任公的不同評價，見該文，頁 29-31。

日，在寫給熊純如的信中，嚴復惋惜任公當時沒有接受他的規勸，因而導致國家動亂，不可收拾：

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又其時赴東學子，盈萬累千，名為求學，而大抵皆為日本之所利用。當上海《時務報》之初出也，復嘗寓書戒之，勸其無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聞當日得書，頗為意動，而轉念乃云：吾將憑隨時之良知行之。（任公宋學主陸王，此極危險）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可喜之論。至學識稍增，自知過當，則曰：吾不惜與自己前言宣戰。然革命、暗殺、破壞諸主張，並不為悔艾者留餘地也。¹²⁰

這一封信可以視為嚴復對清末民初任公思想的總評。這與任公的自我批判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的，上文曾談到任公接受嚴復在《群學肄言》中的警告，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他也說「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¹²¹

民國初年除了上述嚴復單方面對任公的批評之外，兩人還有一些交往與見面的機會。首先是有關憲法問題的討論。民國 2 年（1913）起草憲法的過程之中，成立「研究憲法委員會」（亦稱憲法研究會），由國務院與各省都督、將軍延聘人才組成。嚴復受地方推薦成為該委員會的成員。¹²²此會的會長為楊度，副會長馬良。在民國 2 年（1913）3 月至 5 月，嚴復多次與會。任公雖不在此一委員會之中，但當時他非常關注憲法問題，而且該會「大體維護總統的權力」的立場，與國民黨維護國會的觀點相左，而與共和、民主、統一三黨的立場相同，¹²³任公應該十分注意此一委員會的動向。

民國 4 年（1915），在袁世凱發動帝制之前，嚴梁終於有共事的機會。該年 7 月 6 日，袁世凱任命 10 人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除了嚴復、梁啓

120 《嚴復集》，頁 648。

121 《清代學術概論》，頁 65。

122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頁 411-414。

123 同上，頁 414。

超之外，還包括馬良、楊度、李家駒、汪榮寶、達壽、施愚、王世微、曾彝進等人。嚴梁在此一委員會中共同開過幾次會，至 8 月 14 日楊度等組織籌安會推動帝制之後，委員會才不再運作。¹²⁴對於袁氏的帝制，嚴復感到矛盾、徬徨，一方面被動地列名籌安會發起人之一，另一方面內心雖不贊成帝制，又不願表態；任公則公開反對，撰寫〈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大肆攻擊，嚴梁立場明顯不同。據說袁世凱曾以四萬金請嚴復撰文反駁任公，嚴復表示：「梁氏之議，吾誠有以駁之」，但認為以自己身居政府顧問的立場，所寫的文章無俾於事，袁氏只好改命孫毓筠（1869-1926，籌安會副會長）反駁任公。¹²⁵

民國初年嚴梁均為政治、文化界的名人，除了上述與憲法有關的接觸之外，兩人也曾共同參加一些文化性的聚會。如在上述研究憲法委員運作期間，任公曾邀請包括嚴復在內的名士四十餘人仿蘭亭之會，修禊於京師萬生園。¹²⁶任公作「癸丑三日邀群賢修禊萬生園拈蘭亭序分韻得激字」；¹²⁷嚴復則作「癸丑上巳梁任公禊集萬生園，分韻流觴曲水四首」。¹²⁸又如民國 2 年（1913）9 月，孔教會在北京國子監舉行祭孔典禮，祭典結束之後請三位人士講經，一位是大總統袁世凱的代表梁士詒講「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嚴復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接著是任公講「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嚴梁同台演出。¹²⁹

嚴梁之間也有一些詩文的往來。如民國 4 年（1915）2 月任公的同學、

124 任公在家書中多次談到參與此會，「憲法起草會聞下來復三開第一次會或須一來耳」（1915.7.29）；「今日楊皙子來，知來復六乃開會議，來復五開車來也」（1915.7）；「吾來復五晚車或入京，再詣起草會一次。但風潮正急，又欲托病」（1915.7）；「吾此後擬仍出席於起草會，（若不出席反有嫌疑）」，〈致梁思順〉，《梁啟超家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頁 205、206、208、210。

125 王遽常，〈嚴幾道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77[1935]），頁 98-99。

126 修禊為古時一種灌除不潔的節日。於陰曆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借以祓除不祥。晉王羲之〈三月三日蘭亭詩序〉：「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127 《飲冰室文集》，45 下，頁 70。

128 《嚴復集》，頁 381。

129 見黃克武，〈民國初年孔教問題之爭論（1913-1917）〉，《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12（1984），頁 204。

摯友麥孟華去世，3月14日（農曆正月29日）於法源寺公祭，嚴復曾前往憑弔，並應任公與羅惇融（1871-1924）之邀，賦詩三首。¹³⁰同年四月下旬，任公的父親70大壽，農曆3月16日（陽曆4月29日）在家慶祝，「十八日在省城慶壽，全城官紳商咸集，共謂為空前之盛會」。¹³¹嚴復再應任公之邀，撰寫「三月十六日壽梁卓如尊甫七十」一詩：

榮坑先生誰與儔，至隱不減陳太邱。生兒聲名能九州，高年天星七十周。伯安之翁宜優游，老松偃敵為民麻。一鄉訟爭泯乾猴，蘊崇鸚粟焚墓般。梁上君子驚自投，團保守望勤宵扼。不勞吏為援鼓槍，持己不竟[競]亦不練。乃覆闔井如紅幃，戊己之際罹百憂。刊章名捕鈎黨鈎，攜擎乘桴天東頭。二方愉愉親廁榆，長公學圃利鋤耰。次公登屐窮遐搜，國論有獲皆野謀。新運以之司舌喉，惜哉嫠緯怨隕周。先生太息望松楸，歸里還狎鳬與鷗。康強加昔扶靈塢，季春海屋今添籌。鄉人畀酒炙肥牛，令子南向稱千秋。滿堂賓客皆勝流，賤子隅坐衣親撫。四座莫誼吾請謳，先生為進一觴不。¹³²

這一首詩明顯為一應酬之作，嚴復很客氣地恭維梁父「生兒聲名能九州」；其子任公「新運以之司舌喉，惜哉嫠緯怨隕周」。「嫠緯」指「嫠緯之憂」或「嫠憂宗周」典出《左傳·昭公 24 年》，指寡婦不憂愁自己紡織的緯紗，而擔心周王朝的宗廟社稷。此處比喻任公雖憂國而忘身，可惜清朝卻難逃覆亡之運。

在任公的詩作之中與嚴復有關者有兩首。最早於光緒 28 年（1902），《新民叢報》第 3 號之上所寫「廣詩中八賢歌」稱道嚴復的詩，「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攬亞槧，合與莎米為鰥鶩，奪我曹席太不廉」。¹³³另一首則是民國 2 年（1913）1 月 16 日（農曆 12 月 10 日），嚴復 60 大壽時，任公以「壽嚴幾道先生」為題，所做的賀詩，「近媿真長懷少日，更慚支遁別多時……相

130 《嚴復集》，頁 391。

131 《梁任公年譜長編》，頁 451。

132 《嚴復合集》，冊 5，頁 119。

133 《飲冰室文集》，45 下，頁 13。

看老鳳攜雛鳳，願采霜花進一卮」。¹³⁴

從以上的敘述可見，嚴復與梁啟超在清末民初雖屢有接觸，卻並無非常深厚的交誼。袁氏帝制運動失敗之後，嚴復從此遠離政界，任公則在段內閣受任為財政總長。此後嚴梁之間不再有直接的交涉。民國 6 年（1917）嚴復以筆名地雷在段系人物主辦的《公言報》上發表了多篇文章，解釋德國必敗的原因，亦申明中國參戰之利。¹³⁵此一觀點與任公的看法是一致的，也是後來北洋所採取的決策。這一種契合應係英雄所見略同，其間可能沒有互相的影響。

民國 7 年（1918）年之後嚴復氣喘變得更為嚴重，三年之後再度發病，9 月，在福州過世。任公則在民國 7 年（1918）年底，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的資格赴歐洲，至民國 9 年（1920）3 月才回國。返國之後任公從事文化、教育事業。民國 10 年（1921）秋天，他應天津南開大學之聘，主講中國文化史。這一年他還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與《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嚴復過世時任公沒有公開發表任何憑弔的文字。¹³⁶《清代學術概論》中有一段敘述，可以代表任公對嚴復一生的論斷。他指出嚴復以西洋留學生的身份翻譯西書，有其貢獻；然可惜大多數其他的留學生未能像嚴復那樣致力於「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因而無法建立「健實之基礎」，深入認識西方文明。晚清民初大多數之西洋留學生實愧對國家、愧對時代：

獨有侯官嚴復，先後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穆勒約翰《名學》、《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爾《群學肄言》等數種，皆名著也。雖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復其首也。……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於此運動，運

134 《飲冰室文集》，45 下，頁 69。

135 王憲明，〈嚴復佚文 15 篇考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2，頁 86-94。林啟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嚴復的國際政治觀〉，《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頁 302-318。

136 民國 16 年（1927）康有為過世時，任公撰有〈公祭康南海先生文〉，見《飲冰室文集》，44 上，頁 29-31。

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為社會所輕。就此點論，則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於國家也。¹³⁷

四、結論

嚴復與梁啟超相差近 20 歲，分屬於兩個世代的知識份子。他們是近代中國政治、學術活動的領袖人物，清末以來直至「五四」，新興知識份子的思想或多或少都受其影響。無論是胡適還是毛澤東，嚴梁都是他們思想啓蒙的導師。胡適說嚴復所譯的《天演論》，「風行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的心和血」。任公對胡適的影響更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他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著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¹³⁸毛澤東也肯定嚴復與梁啟超。他認為嚴復和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是「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任公在《新民叢報》上的文字，對毛深具吸引力，「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¹³⁹

由此觀之，嚴復、梁啟超奠定了五四以後中國思想發展的重要基礎。然而誠如前述，嚴梁在思想上親和，在私交上卻頗為疏離。根據以上的討論，任公深受嚴復譯作之影響，但奇特的是兩人之間主要的交會不在學術討論，而在詩文酬和，以及嚴復單方面地抨擊任公的政治立場。嚴復從戊戌前夕到他過世之前，一貫地在公私場合批評任公在言行上的激烈、躁進，造成中國的亂象。他完全抹煞任公在光緒 29 年（1903）之後言論上從激進到保守的重大轉變。

137 《清代學術概論》，頁 72。

138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6），頁 49-50。

139 胡適、毛澤東與任公思想的關係請見，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 55-57。

作為後輩的任公則默默地接受嚴復的批評，除了光緒 23 年（1897）所寫的〈與嚴又陵先生書〉之外，我們看不到任何的反駁。民國初年，在嚴復激烈抨擊任公的時候，任公一方面賦詩祝賀嚴復六十大壽，另一方面邀請嚴復修禊於京師萬生園，又請他為好友麥孟華的逝世與父親的七十大壽賦詩數首。

嚴梁之間的關係，和梁啟超、胡適之間的關係有非常明顯的不同，其間反映出時代的變遷。梁胡之間有更多學術上的討論，少有政治辯論，而沒有詩文酬和。相對於嚴復對任公激進、革命的批評，胡適卻以為任公最大的貢獻在「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最大的缺點是「他晚年的見解頗為一般天資低下的人所誤，竟走上衛道的路上去」，他所謂「天資低下」者是指歐陽竟無、林宰平與張君勸等。¹⁴⁰胡適或許沒有想到已經過世的，一方面好用桐城古文那種「死文字」，另一方面比任公還要「衛道」的嚴復，但無疑地嚴復、梁啟超對他來說都是「過氣」的英雄。嚴復與胡適對任公評價的差異，顯示中國激烈化的走向日盛一日。嚴復對任公以及整個時代的逆耳之言，在《學衡》雜誌上披露出來，¹⁴¹但對五四新青年來說，這些想法僅僅象徵著「封建遺毒」所做垂死的掙扎，最後終將為時代所淘汰。嚴復、梁啟超均曾掀起時代求變的狂潮，然而在死後，卻被深受他們影響的新青年們視為是保守、落後的「衛道」之士，這或許為兩人始料所不及。

嚴復與梁啟超的交往也讓我們反省中國知識份子之間的合作關係。嚴梁均為現代中國引介自由主義的先驅人物，但在彼此交往時卻缺乏自由主義所特別強調的容忍精神，因而無法捐棄成見，相互合作。嚴復不斷地批評梁啟超，又不理會任公思想在 1903 年之後的重大變遷，梁則默默地接受前輩的批評。兩人對於學術、政治的關鍵議題，無法進行合理的對話，僅於詩文酬和之中維繫一般的友誼。（比較而言，嚴復與梁啟超之間的對話，遠遠不如黃遵憲與梁啟超之間的對話所具有的建設性）總之，嚴梁的交往關係與西方市民

140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份子的親和與排拒〉，頁 106-108。

141 有關學衡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見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北：台灣大學文史叢刊，1984）。學衡派藉著刊登嚴復致熊純如的信，來表達對新文化運動的不滿。

社會中的「公民精神」(civility) 不相配合。Sunil Khilnani 在一篇討論市民社會的文章中指出：市民社會需要一種特殊型態的自我觀念，此一自我受到「文明的自我利益」(civilized self-interest) 之引導，因而能對他人想法具開放的心胸，而且瞭解到自身的利益不是既定不移的。¹⁴²這樣一來，自己的立場不一定是道德或正義的化身。在此情況之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需要完全同意對方所有的想法，而只追求扼要地找到彼此間達成團結合作的共識與信任。作為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先驅人物，嚴復與梁啟超顯然都不夠瞭解西方市民社會中的「公民精神」，更談不上以此為基礎來相互合作。嚴梁交往的這一段歷史經驗，透露出中國知識份子面臨的一個難題，以及自由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嚴重障礙。

142 Sunil Khilnani,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Sudipta Kaviraj and Sunil Khilnani eds., *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8.